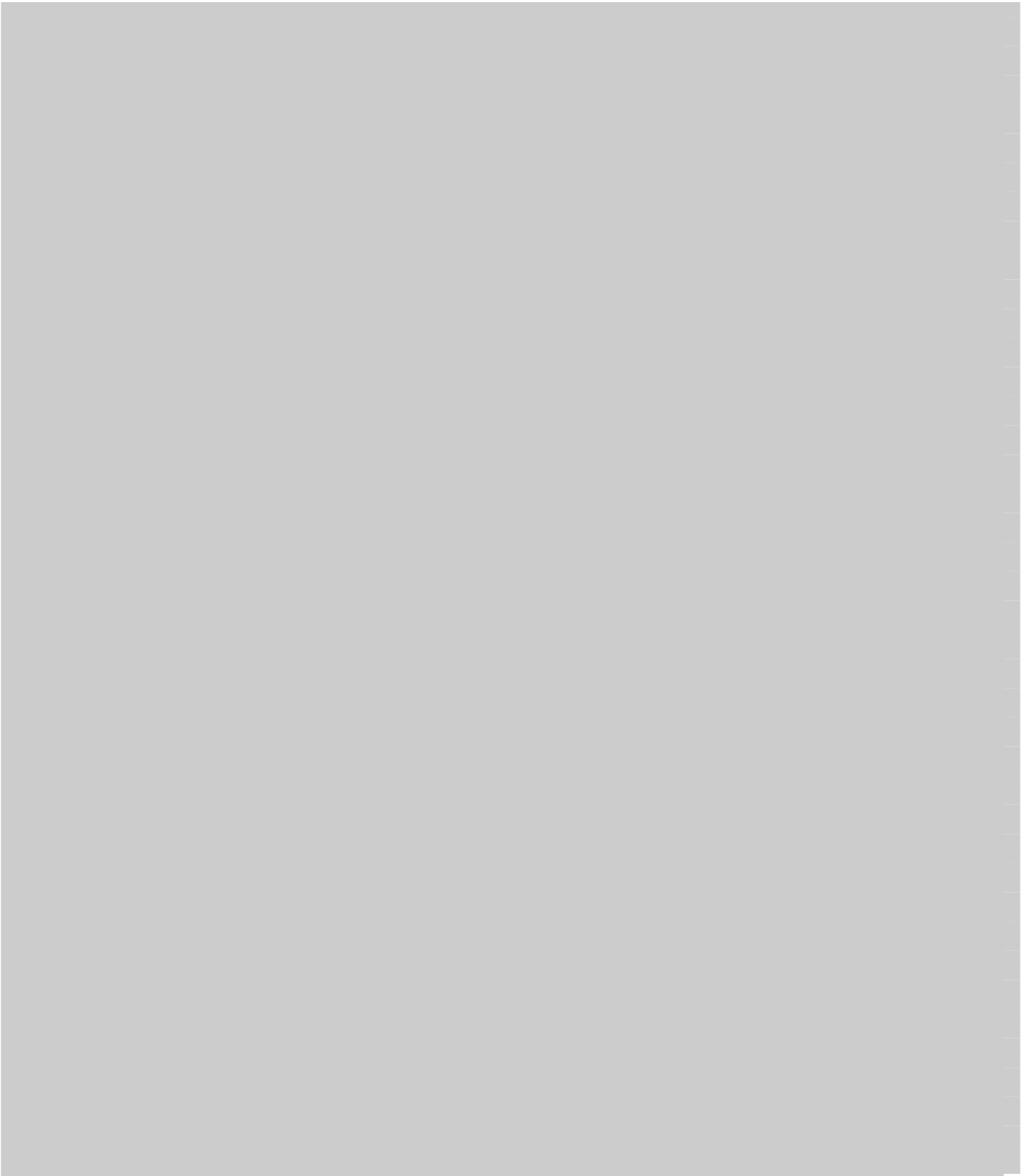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书大转移	1
倾城之痛	41
悲情讲述	69
奋起抗战	117
抗日募捐	161
寻找抗日老战士	179
寻找飞虎队足迹	225
从抗战遗址开始的民间追忆	261
旋律中的记忆	289
胜利欢呼	325
附件	345
后记	353

## 目 录



## 序 言

桂林日报社党组书记 社长 毛登峰

《桂林晚报》策划的“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型特别报道--不能忘却的记忆”，从2005年5月24日征集线索拉开序幕。“不能忘却的记忆”作为报道栏目，也作为报道的核心贯穿于整组报道的始终。100余个日日夜夜，100余篇报道近20万文字，还有150余幅图片，为这一组特别报道画上了圆满句号。

在采访报道中，记者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市井乡村的普通民众，抗日战场上默默无闻的普通战士。然而，正是通过这些普通者的亲历口述，我们看到了湘桂线上大逃难中的妻离子散；看到了手无寸铁的父老乡亲的惨死；看到了那一年八月十五“母死儿孤独”的中秋月；看到了森森白骨洞里无数冤魂的无尽呻吟……众多普通民众的记忆，真实再现了我们民族遭受的深重苦难，揭露了日本鬼子惨无人道、罄竹难书的罪恶行径，构成我们难以忘却的集体记忆。

通过这些普通者的口述，我们更感受到了铁血男儿陈家伯父“不灭倭寇誓不回”的爱国情怀；听到了盘古岭上不息的枪声；看到了村民向鬼子开了枪，胡老四把日本兵丢下了水塘，自卫队员毙了汉奸“天拐子”，还有临阳联队智取敌船后胜利的喜悦……众多普通民众的记忆，

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桂林人民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，众志成城，前赴后继，英勇战斗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正义战胜邪恶、光明战胜黑暗、进步战胜反动的英雄画卷。

3个月太短，还有太多的报料和讲述来不及聆听；20万字太少，远不足以记录我们那一段血泪与战火的历史。3个月中，讲述者的经历一次次地感动和震撼着我们这些记录的后辈；在一次次地感动和震撼中，讲述者难忘的记忆也深深地烙在了我们的脑海，成了我们不能忘却的记忆。然而，让记忆永存心间并非最终目的，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不能忘却的记忆，激发大家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，抓紧机遇，开拓创新，奋力拼搏，团结一心，为建设建设和振兴中华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！

我们的报道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大力帮助和支持，许多读者给我们报料，有的打电话或写信诉说读后感想，有的来信建议将“记忆报道”集书成册，永存纪念。现在，我们应读者的要求，将这组报道结集出版，让更多的读者了解那段难忘的历史，了解那些鲜活的抗日英雄，并将抗战岁月的民间记忆永存心间！

记忆没有尾声。如果人们能在这有限的记忆中，因我们的感动而感动，因我们的震撼而震撼，并读出一些“勿忘国耻，强我中华”的声音来，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奖赏。



## 图书大转移

桂林沦陷前，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一批珍贵图书顺漓江—桂江而下，运到昭平县富裕乡一个小村子保存。抗战胜利后，幸存的图书又运回桂林。

因为是劫后幸存，图书从昭平一回桂，就打上了“劫后存书”印章。

2005年夏天，记者从桂林开始了对“1944—1945桂林图书大转移”的追溯。

.....

- 追溯抗战时期桂林图书大转移 上篇：桂林图书馆的记忆 3
- 追溯抗战时期桂林图书大转移 中篇：富裕村的记忆 8
- 追溯抗战时期桂林图书大转移 下篇：裕礼村的记忆 15
- 亲历图书大转移 23
- 誓与图书共存亡——马姑娘：与桂林图书馆一起流亡的日子 27
- 回忆我的父亲 32
- “您与晚报有缘” 39
- 资料链接 40

.....

## 追溯抗战时期桂林图书大转移

上篇：桂林图书馆的记忆

2005年5月25日上午，记者接到桂林图书馆借阅部主任杨邦礼来电，告知桂林图书馆一批珍贵图书在抗战时期桂林沦陷前，顺漓江一桂江而下，运到昭平县富裕乡一个小村子保存。抗战胜利后，幸存的图书又运回桂林。

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。根据杨邦礼主任的报料，记者在桂林开始了对“1944—1945桂林图书大转移”的追溯。

桂林图书馆馆志资料的文字记录



▲ 保存在桂林图书馆的劫后存书

今天的桂林图书馆（分部）坐落在风景如画的榕湖边上，紧邻古南门。25日下午，记者走进了这座有着90多年历史的图书馆，采访了杨邦礼主任。

1977年，刚进桂林图书馆工作的时候，杨邦礼就听说了抗战时期运书、护书的故事。在他提供的桂林图书馆馆志资料中，我们也读到了相关情节：

摘录一：“民国33年（1944）秋，日寇入侵湘桂，桂林紧急疏散，图书馆奉令东迁昭平，由于人力、财力、物力及时间的限制，仅能将分馆所藏大部分和总馆部分精要图书及重要报刊，共71481册分装260箱，于9月10日起航，水运到昭平县城下游20公里江边的富裕乡石人岛小村存放。”“后因梧州、平乐、蒙山相继失陷，三面皆敌，为避日寇窜扰，又搬入海拔700米的深山小村裕恒村，化整为零地进行分藏。”“民国34年（1945）秋，抗战胜利，图书馆奉命复返桂林，12月将书迁回。”

摘录二：“民国33年至34年（1944—1945），桂林沦陷，员工藏书疏散昭平，与当局联系中断，经费来源断绝，员工只靠打柴做小买卖维持生计，保护藏书。”

“听老馆员讲过，这批图书的运送过程中，曾在兴坪遭遇沉船，护送的馆员们将书捞起来，在岸上晾晒。”杨邦礼将他所知的史实一一给我们作了介绍。但毕竟年代久远，杨邦礼建议我们采访解放初期进馆的老馆员，也许他们知道得更多。



▲ 劫后存书上有水印子

两位老馆员提供的有用线索

当天下午近5时，我们来到了侯小兰老师在安新洲的家。

听说我们要做抗战胜利60周年的特别报道，侯老师十分高兴，也十分热情，她说老图书馆员们爱书护书的这段历史应该让年轻人知道。侯老师1951年刚满16岁进桂林图书馆工作时，就听老馆员口传过“劫后存书”的故事。

“这批书是馆里非常非常珍贵的。”至于图书转移的其他细节，侯老师表示遗憾，她当时听到的也不详细，只知道有这样一个保护图书的过程，护书时期的馆长是黄远智先生。

但是，在侯老师家收获最大的是，侯老师接通了与她同期进馆的老同事唐国英的电话。唐老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，抗战前后在任的两位馆长写有回忆录，收集在《桂林文史资料》丛书里，好像是第六、七辑，也许那上面会有更详细的记录。

唐现之馆长的文章摘录

根据唐国英老师的指点，第二天，我们在报社资料室查找《桂林文史资料》。很巧，在书柜一排多本《桂林文史资料》丛中，我们随意抽出了第三辑，正好就有唐老师所说的龙兆佛、唐现之两位馆长的文章。

翻阅之下，其中唐现之先生的《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之今昔》一文，在“图书馆之保存及疏散”一节中，对图书搬迁昭平，有较杨邦礼主任给我们提供的馆志资料更为详细的介绍。现摘录如下：

33年秋，日军侵桂，本馆奉令疏散，时馆长龙兆佛业已辞职，黄代馆长远智临危受命，因爱护地方文化，遂毅然肩斯重责，并将馆中

最重要及重要图书概行装箱，计约7万余册。惟以当时交通工具缺乏，仅奉拨25吨民船一艘，容量只能载最重要特藏图书二分之一，约万余册。至9月初领到疏散费40万元，始得雇民船5艘，将须运载之精要图书（约占全馆图书三分之一）运抵规定疏散地——昭平县属之当（富）裕乡存放。

嗣梧州、平乐、蒙山等县相继沦陷，昭平三面皆敌，本馆与省府失去联络，经费无从领获，随馆疏散人员，生活极艰困，而又风声鹤唳，一夕数惊，迫得再将各项重要图书，化整为零，分头搬运存放，其时敌人距本馆度藏图书之地，仅五里许，馆中同人，莫不忧心戚戚。

迨至34年秋，日军投降，本馆遂于10月，奉令迁桂，于12月初始得将疏散出外之大批图书全部安然运返本市。

据唐现之先生的文章附录，龙兆佛先生为湖南人，1937年3月至1944年8月任馆长，时已称广西省政府图书馆和广西省立图书馆；黄远智先生是桂林人，1944年9月到1946年3月代理馆长。唐现之先生为灌阳县人，1946年4月始任馆长。唐现之先生《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之今昔》一文辑于《桂林文史资料》，原载于《广西教育季刊》第一卷第二册，1947年3月15日出版。

据侯老师介绍，上世纪60年代，黄远智先生又重返桂林图书馆工作，曾担任阅览部主任。在采访中，我们很想找到黄远智先生及当年护书馆员的后人，也许在父辈的口传中，他们会知道一些转运过程的艰难情节。然而，我们没有找到线索。

见到了有“劫后存书”印章的藏书

“因为是劫后幸存，图书从昭平一回桂，就打上了‘劫后存书’印

章，以纪念这段不平常的历史。”5月26日下午，在桂林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梁宇主任的引领下，我们看到了这批珍藏书中的珍品。

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本线装书，(清)王拯撰的《龙壁山房诗草》[版期：咸丰九年(1859)刊，四册]、(清)朱琦撰的《怡志堂初稿》[版期：咸丰七年(1857年)二册]，这是劫后幸存的珍品之一。梁宇翻开书的第一页，指着书眉上的一些印子说，纸张有不少皱纹，很明显这些书当年被水浸过，水渍印依稀可见。像这两套书，目前国内大图书馆也已是寥寥无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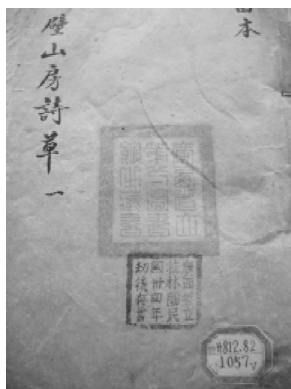
与桂林图书馆的其他藏书不同，这些书的封页上有两个印章，一红一蓝，红为藏书印章“广西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”，蓝为“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民国卅四年劫后存书”印章。

在桂林图书馆工作了二十多年，梁宇一直有这样的感叹：正是因为转移及时，才有这些图书珍品留存，才有桂林图书馆在广西业内的龙头地位。梁宇的话不无道理，因为我们在馆志资料上读到过，“留桂图书，则在战乱中毁于兵燹”。

而在唐现之先生《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之今昔》的行文间，更流露出对黄远智先生当年担当重任的钦佩之情：“所有本省重要文献及各种珍本善本，均获保存，此皆黄君远智，抢救得力，保护有方，于本省文化前途，厥功非小，真可谓‘敬恭桑梓’矣。”“然保存图书数量，虽仅为原有图书三分之一，但皆经守别选之精华，且多属绝版之珍本，其名贵不能以价值计。”

读着桂林图书馆当年的沧桑，我们也是感慨万千：“劫后存书”逃过了60年以前那场日本侵略军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浩劫，确为桂林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！

▼ 图书回到桂林，立即打上了“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民国卅四年劫后存书”印章



# 追溯抗战时期桂林图书大转移

## 中篇：富裕村的记忆

2005年6月1日，记者打电话到昭平县，请求当地政府帮助寻找当年桂林图书在昭平的线索，县史志办梁居中主任很快回话——富裕村“有戏”。6月2日，我们登上了赴昭平县的直达快巴。6月3日清早走进了富裕村。

于是，60年了，第一次有桂林记者到这个不为外界所知晓的小山村，追溯60年前桂林图书馆那批珍贵图书在这里躲避劫难的历史。

因当年的“大人”已很难寻找，我们的采访对象大多只能对准当时还是青少年的人，集民间记忆的碎片，再现当年桂林图书大转移的片断。

片断之一：李美泉老人指着石人码头说，当年图书就是从这里上岸的

86岁的李美泉是一位十分热心的离休老人。抗战桂林沦陷前老人到过桂林，“玩过七星岩，去过尧山靖江王墓区”。6月1号接到梁居中的电话，李老就做了踩点准备，还写了一段关于桂林图书避难富裕村的简要经过。这让我们很感动。尽管那材料没有多大用处，可他提到的石人码头，正好与桂林图书馆馆志中提到的石人码头相吻合，这



▲ 李美泉老人：这就是石人码头

让我们十分兴奋。

一见到我们，李老马上“全副武装”，戴上太阳帽，肩挎小背包，手持拐杖，雷厉风行，招呼我们出门直奔石人码头。

“这就是石人码头，当年这一片桂江河谷停满了各种各样的木帆船。码头有七条道与村前的路相连接，相当繁忙。”

今天的石人码头，江水滔滔，但已没有了当年忙碌的痕迹，只有路边仍然完好的一排老房子。老人说，60年前疏散到昭平的广西土产公司曾用过这排房子。

老人告诉我们，他在1944年桂林沦陷后，从桂林回到昭平，担任乡抗日自卫队的一个分队长。桂林图书馆运来的那批书就放在富裕（当年称裕仁）村育才小学。当枪声响近时，又从富裕村运到了裕礼（当年称裕恒）村的深山中。

李老还告诉了我们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当年桂林图书馆遗留下来一

只白瓷花盆，花盆上有“桂林图书馆”字样，富裕村还有很多人帮挑过图书。

这花盆到底是不是当时物件？被谁收藏？还有没有帮挑过书的人健在？

李老看出了我们的心思，他带我们来到了富裕村的李庆道家。李庆道家门口正对着育才小学旧址。顺着老人所指，旧址今天已成了一片花果山。当年只有8岁的李庆道，对桂林图书馆的事还有一些记忆。

“书都是用小木船运来，过天把两天来一船。”“书箱装在竹篓里，两人抬或者一个人挑到育才小学。”李庆道说，站在家门口就可以看见挑书的人。但他表示自己从没有进育才小学看过，书是什么时候运走的，运到哪里也不清楚。

然而，从李美泉老人和李庆道老人的介绍中，可以肯定一点，桂林图书馆的确运了一批书到这里，但馆员是怎样保存这批书，经历了哪些磨难、哪些周折，他们都不清楚。

片断之二：见过馆员上山捡柴，有时也看见他们挑柴去卖。当年的新娘子还说有馆员揭开了她的红盖头

我们在李美泉老人的带领下，又来到了离富裕村较远的一个自然村，找到了当年17岁的老人陆怀文。陆家在育才小学的北面，家门口与育才小学相望。陆老对图书馆的记忆多了一点。富裕村的村民们讲的都是我们听不懂的土白话，史志办梁居中主任为我们当了一个上午的翻译。

我们问陆老是否见过那批书，陆老说：“书都是用木箱装着，石人庙（育才小学就在石人庙里）的两间房子都装得满满的。”陆老说当

时他是透过窗子往里看到的。“但那些书从不外借。”

陆老还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条信息。当年有人死在了村上，也葬在村子附近，墓碑上刻有“司马母氏”的字样，是不是当年的图书馆员或家属，不能肯定，但这个人跟图书一同来到富裕村的。

坐在一旁听我们聊天的李绍珍老人、陆怀文74岁的老伴，听懂了我们在说当年图书馆的事情，她插话讲了一个精彩故事：“1944年农历十一月，我嫁到陆家，有图书馆员来凑热闹，揭开我的红盖头偷看新娘子，连连说‘长得好白净’。”

“图书馆员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有十多人，他们都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。”陆怀文回忆，“他们烧的柴都是自己捡的树枝和竹子，家属有的还是小脚，看他们捡柴都不方便。”“有时也看他们挑柴去卖，但很少看他们买菜买米，不知道他们吃什么。”

片断之三：伯父有一本《辞源》，那书印有桂林图书馆的章。79岁的徐瑞申老人说

陆怀文老人给我们讲的桂林图书馆形象生动，让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追溯也更充满了信心。

“目标正前方，一公里外的村庄。”参加过抗战的李美泉老人，用了一句军营用语，同时称我们为战地记者，几句话平添了我们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豪气。

沿着田埂路向离富裕村更远的自然村前行，路两旁的稻子已长出了稻穗，太阳很大，白晃晃的。前面一位老人与李老打过招呼，与我们擦身而过。何不问问他知不知道桂林图书馆一事，知不知道桂林图书馆的花盆？

▼ 当年的新郎和新娘





这个花盆留在富裕村已60年了，它也是历史的见证

通过梁居中的翻译，巧的是他全都知道，而且曾经拥有过桂林图书馆的一本字典呢。

老人名叫徐瑞申，今年79岁，当年已有18岁，对那段历史应该比较深的印象。他正准备去理发，我们请他先回家聊聊再去。

徐老说他抗战时在藤县上初中，鬼子进藤县后他就回到了昭平，参加了乡抗日自卫队。他拥有的那本字典，就是那时他伯父买下的一本《辞源》。因他是读书人，就由他保存。“那书很厚，可以做枕头，书盖有桂林图书馆的章，红印。”徐老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。

听徐老这样一说，不能排除当年图书馆与当局联系中断，无经费来源，在生活十分艰苦，没有吃的情况下，可能拿了一两本不是很重要的书去换一点粮食。

徐老的叙述，把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忙问“梁翻译”，这本书现在在哪里？

“可惜，太可惜了！”徐老说“大集体”的时候，书充了公，后

来就不见了。但徐老也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好消息，图书馆的花盆就在他隔壁左德志的家。

我们请左德志从家里拿来了花盆。左德志说这花盆是拆石人码头旁的房子时他父亲捡回来的，当时只认为花盆好看就捡回来了。花盆是瓷白色的，跟现在的普通花盆一般大小，盆的边缘用水泥糊着。

花盆上果然印有字，从左到右竖着书写：“民国四年秋广西宾阳瓷器厂出品”。我们找了个遍，也没有桂林图书馆的字样。大家推测，这花盆也许是当年图书馆员的，也许纯粹就是当年土产公司的商品。

徐老也向我们提供了村外面有一座墓的情况，是当年疏散到富裕村的人所葬的墓，也许与当年的图书馆员有关，那时的图书馆员有十多位。

片断之四：书最先是放在码头旁的姚伍记中药铺

战事吃紧的时候，书运到了裕礼村，那在裕礼的情况又会怎样呢？用过中餐已是下午1时多，经李美泉介绍，我们乘车来到了裕礼村胡盛基的家。

“当年的图书馆馆长就是唐现之，他写了很多的文章，到过六洞庙。书就放在庙里，有一个花盆，现在还存在一户姓左的村民家里，据说就是图书馆的，应该算文物了。”

个子不高，当年19岁，在富裕中心校当老师的胡盛基说得很肯定。胡盛基说他曾与馆长擦肩而过，他说馆长个子瘦，看上去约有40岁，旁人说他就是馆长。据上篇提到的唐现之先生的文章说，当年运这批书到昭平避难的，是代理馆长黄远智。胡老怎么说是唐现之呢，这让记者感到很吃惊。